

编者按：英国地理教育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悠久的历史，虽然几经沉浮，但在地理教育研究者、实践者与地理学界人士的通力协作中，日益在英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引领着许多研究领域的变革。英国地理教育研究的高地正是本文提到的这所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自2013年来它在世界大学QS排行榜上蝉联教育领域第一的位置。其中大卫·兰伯特教授是地理教育研究的学术泰斗，克莱尔·布鲁克斯博士是教育学院课程、教学与评估系主任，也是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现任联合主席之一（2016-2020）。因此，《地理教学》编辑部邀请我刊原助理编辑、现该学院博士生缪鑫从多角度更全面深入地《地理教学》的读者呈现英国地理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

英国地理教育五十载沉浮*

——侧写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 专题讨论会

缪鑫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课程、教学与评估系，英国 伦敦 WC1H 0AL）

摘要：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五十周年专题讨论会从过去、现状、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回顾、探讨、展望在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上所做和将做的创新与发展。借镜这所教育研究领域标杆性学校的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为读者理解过去半个世纪里英国地理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侧写英国地理教育界顶尖学者、新秀学者与一线教师的对话，也为我国地理教育领域从业者思考大学与中学、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系呈现了另一种方式。

关键词：地理教育；英国；教育硕士；地理教师

一、背景

2018年10月17日下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一间大型会议室里召开了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五十周年庆典。该项目的在读学生、毕业生、对该项目感兴趣的地理教育研究者们齐聚在这间会议室，与学院师生、英国的地理教育从业者们一起回顾过去、讨论现在、展望未来。

专题讨论会分三个部分：大卫·兰伯特（David Lambert）教授与受邀嘉宾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关键节点，克莱尔·布鲁克斯（Clare Brooks）博士与毕业生们一起分享了学生们做过的研究及其对地理教育研究的贡献，玛丽·法杰（Mary Fargher）博士与在读学生、任课教师一起探讨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笔者将结合发言者的学术经历、文章、观点等，首先对人物作简要评述，随后总结其在研讨会上的核心观点，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几位学者的学术背景、研究旨趣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避免因语言转换带来的望文生义，并且能够在一定的情境中去理解这些英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从而引发读者的讨论与思考。

二、主要发言

1. 兰伯特：不止于教，教师需要给未来的孩子制作地理

专题研讨会以兰伯特对于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回顾开始，他选择的切入视角是以史为鉴，选取的时间节点和关键事项也与他个人的经历与研究不无关系。1986年，兰伯特以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身份加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之前，已经在英国一所综合中学做了十二年的地理教师，并且担任着副校长的职责。他在教育学院曾经分管职前教师教育研究，并且在学院引介、推动了教学硕士（Master of Teaching, MT）的发展。2002年起他辞去在IOE的教职，成为了英国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的执行长，帮助这个机构转型成为提供教师专业发展（conti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开发相关地理课程的行业标杆机构。他本人在2007年9月又回到教育学院，受聘成为地理教育方向的教授，研究领域为地理课程开发（curriculum development- Geography）。^[1]2010年，他与约翰·摩根（John Morgan）合著的《地理11-19：一种概念视角》（Geography 11-19: a conceptual approach）^[2]，其

*本文系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08060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提出的课程制作 (curriculum making) 模型在欧美地理教育研究界引起热议。布鲁克斯曾撰文专门总结课程制作模型对国际学界的影响。^[3]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研究团队中负责中学教师培训项目的大卫·米切尔博士就以该模型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探讨了当今这个时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地理教师,以期更多人理解地理教师制作地理课程 (how geography teachers make the curriculum) 的重要性。^[4]2013年至2017年间,兰伯特也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麦克·索勒姆 (Michael Solemn) 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西帕·塔尼 (Sirpa Tani) 教授共同主持地理可行能力项目,与其它学科的理论对话、与各国的研究伙伴合作,从多个角度发展完善课程制作模型。^[5]笔者曾作为研究助理参与项目,见证了该项目通过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将这一课程制作模型与福利经济学的可行能力视角、教育社会学的强有力的知识一起成为教师培训模块中的核心内容,对各国思考未来地理教育中地理教师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6]这一模型也日益得到学界认可,被认为是立足地理学科本体,结合其它学科理论优势的前沿研究成果。^[7]

兰伯特以史为鉴的主题是那些培育、引领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关键人物和时代背景。他请到了在1968年开创这一项目的诺曼·格瑞夫斯 (Norman Graves) 教授分享了创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正是因为当时教育学院已经有了心理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的硕士项目,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科目 (subject) 为研究主题的硕士项目,于是就有了这个敢为人先的项目。随后是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约翰·摩根表达了他自己先作为学生、后作为教师参与这个项目的感受,并且向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研究教育中的地理还是地理和教育? (Geography in education or geography and education)

兰伯特将五十年划为五个时间点:1968、1978、1988、2008、2018,逐步呈现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当时地理教育界的著作以及学院里负责该项目的同事,揭示了六十年代末的人类登月、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八十年代末的英国首次确立国家课程、九十年代家用电脑普及和过去十年的伊拉克战争、社交媒体兴起、英国教师教育去制度化、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国际重大事件也对英国地理教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并且许多影响将在未来继续左右地理教育的走向。在我们被这些丰富多样的信息包围的时候,他提到了大卫·沃德利 (David Wadley) 如何论述地理对于当代人的意义^[8],笔者结合兰伯特在自己文章中对沃德利的引用^[9]转译如

下:我们生活在永不停息的全球城市里,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削弱我们对自己和周遭事物的思考能力。而在地理教育领域,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教育的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追索到能让我们找回智慧的“和平花园” (garden of peace)。

在兰伯特眼中,像地理这样的学科 (disciplines like geography) 就是和平花园的象征。而在这个比喻中,课堂就成了能够持久抵御外界压力和噪音的场所,是一个高度重视逻辑思维的空间,在这里学习的节奏是可以慢下来的。这并不是要否定数字时代、全球化发展、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兰伯特看来是课堂在教与学之外,需要再加一个课程制作 (curriculum making)。只有将教师也看作课程的来源,让教师作为根据教育目的解读课程内容的专业人士,教育才可能迎来深刻的改变。而使得教室成为专业人士的“和平花园”,虽然它无可避免仍然是永不停息的城市中的一部分,但它又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理性的绿洲 (an oasis of reason)。而高等教育就是保护和培育独立智识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的场所,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能够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深刻、理性的认知^[10]。因此,在他分享的最后,他将自己对于地理教育价值及研究的理解与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指出对未来的地理教师的期待是教师能够想得比传授、实施更远一些,意识到地理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拥抱自己“课程制作人 (curriculum maker)”的身份。

2. 布鲁克斯:不止于写,研究与实践之间要有更多对话

布鲁克斯关注的焦点则是几十年来硕士毕业生的研究及其对地理教育的贡献。作为课程、教学与评估系的系主任,教育学院职前教师教育的负责人,她对毕业生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这个视角也与她主要的研究兴趣相契合。她多年都在关注教师发展以及教师如何运用自己的科目知识来参与课程。她不仅关注教师如何参与到地理教育中,而且也关注教师发展的过程、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成长。^[11]科目知识如何影响教师参与到地理课程中是她博士论文的主题。^[12]2016年,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与近年来追踪研究的结果结合,整理出版了专著《专业实践中的教师科目认同感:教学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南针》 (Teacher subject identity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with a professional compass)。^[13]她的学术成就与沟通能力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2016年她当选了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她不仅更注

重地理教育研究中的循证为本^[14]，也关注叙事研究的价值^[15]。同时她也积极在学界组织国际性的专题会议、主编出版文集^[16]，为2016年更新的地理教育国际宪章的推广应用做出贡献^[17]。布鲁克斯近年来的研究正是她宏观视野与出色沟通能力的体现，也是她理性思考、辩证看待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落脚点。

布鲁克斯就“地理教育硕士项目学生的研究及其对地理教育的贡献”进行分享时，选取的切入角度主要是以文识人，而她对于这些硕士论文的回顾也于早前发表。她从2013年开始，整理阅读了四百多篇硕士论文的文题、摘要、作者与日期，对其主题进行了分类、按照年份进行了排列，并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她坦言这些论文的质量良莠不齐，有些读一遍就能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有些即使读了几遍也无法理解。而她做这一回顾的目标旨在理解地理教育领域的实践者们如何理解、如何试图去解决地理教育中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全部出版，大多数也没有得到广泛引用，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些论文成为了地理教育研究重点变化的标志，值得研究者去思考一线教学的老师们经历过什么、当时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18]她在汇报中将这些论文研究的主题归纳成三种趋势：1.研究方法：逐渐从历史性回顾、做问卷调查转向实践者主导的行动研究（她强调尽管有些从概念上来说并不能严格算作行动研究，但至少是实践者做的研究）；2.研究尺度：逐渐缩小，从大的全国性的尺度逐渐变成个人的、课堂的尺度；3.研究内容：主要的三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教什么？（课程）我们应该怎么教？（教学）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教得成功了？（评估），呈现出明显的教学论转向。

布鲁克斯尤其指出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研究内容正是课程、教学与评估体系的系所关注的三个重点。她在邀请毕业生分享自己的经历之前，还将她眼中地理教育硕士项目存在的意义总结为两点：重新创造车轮，但已经不再是一开始的车轮；持续为学者与实践者做的研究创造对话的机会。

两位受邀分享的毕业生都谈到曾经的求学经历现在对自己的影响。先做分享的男士拿出了一件短袖，上面的文字是“No place like home”，第二位做分享的女士拿出了自己上学时用的课本以及在教育学院求学期间得到的作者寄语。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历出发分享了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求学时期的经历是如何鼓舞并且支撑他们继续在地理教育领域里前行直至今天。笔者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两位毕业生都提到来读硕士的时候，能够和这些自己上学时所学教材的编写者们在同一个场所里

对话，得到耐心指导的同时，也感受到学者们愿意与自己平等对话、探讨地理教育议题的真诚与尊重。

布鲁克斯随后指出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一直都拥有非常国际化的高质量生源，不只是对英国地理教育有深远影响，也一直有来自欧美其他国家、亚非大洋洲的国际学生不断参与。她认为不是我们拥有这个教育硕士（we don't own this MA），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地理教育硕士的卫士（we are custodians），我们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硕士项目的存在，我们得以花更多时间在一起精研地理教育。她认为教育学院在并入伦敦大学学院之后，会有更多的国际学生参与到地理教育项目中来。在这样更大的“和平花园”情境中，未来地理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开放对话氛围也会变得更加包容、多元，不同项目与课程之间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有更多合作可能性。她认为会有更多人想要先成为一个硕士，再去做一个教师。她最后回到了约翰·摩根之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研究教育中的地理还是地理和教育。布鲁克斯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这些在大学中致力于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放在当今这个新的时代下，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拓展地理与教育的关系。

3. 法杰：不止于此，地理教育研究有更多样化的未来

专题讨论会的第三部分由目前负责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玛丽·法杰主持。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如何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与学校地理课程中的地域知识联系起来^[19]。近年来她在兰伯特主编的《激辩地理教育》（Debat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文集中发表了地理信息相关的章节^[20-21]，并且在《地理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文集中论述了地理思维与GIS之间的关系^[22]。2018年她也跨出了地理教育研究领域，在地理信息领域的核心期刊发表了将地理可行能力视角与网络地理信息相结合的文章^[23]。作为学术领域的新秀以及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现任负责人，法杰虽然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她将学术工作与教学工作都处理得有条不紊。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研究团队每月一次的内部研讨会、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伦敦分会也都是由法杰通知、召开。同时法杰也是活跃在推特上的Geography UCL IOE（@IOE_mageged）账号的维护者。

这次分享她主要讲述的是作为地理教育研究者的我们如何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成长为地理课程的引领者。她认为这正是现在地理教育硕士项目所希望尽到的责任。她希望这是一个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可以

在教学的时候想到自己并非来这里寻找答案,而是由此能够问出更多、更触及本质的问题。她同样认为“和平花园”是非常重要的空间,地理教育硕士项目应当是一个让学生能够自由参与讨论、进行学术辩论、探讨的空间。相比在职教师的专业拓展,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不止于详细审视教师所教的地理科目,更是提供了一个通过接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地理与教育关系的机会。她援引约翰·摩根提到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她的设想: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不止要思考在教育中的地理,更要思考在教育与地理的关系,还要去设想在教育之外的地理(geography outside education)会是怎样的图景。她认为学生在修习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过程中,也在与这个真实的世界有着密切的互动。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应当只看到学校所教的地理科目和学生,更要看到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下在学校这个“地理教育盒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教育,地理人也在和这个充满着复杂性的世界进行着深刻的互动。

法杰分享了2018年硕士班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有人研究地理是否有清晰的定位问题,有人关心教师能够在新的初中地理(GCSE)课程中“找到”多少“强有力的学科知识(powerful disciplinary knowledge)”,也有人探索如何把地理放回到高中地理(A Level)课堂中去,有在思考年轻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所接受的地理教育的,还有学生把强有力的地理和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课程与自己的实践经历结合起来。从这些论文的标题中可以看到地理、强有力的知识、强有力的学科知识与地理教育的价值,是近年学生研究的主题。其中强有力的学科知识正是兰伯特在地理可行能力项目中结合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扬(Michael Young)近年来提出的强有力的知识^[24-25]拓展而来^[26]。这些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正印证着兰伯特和布鲁克斯的期待,即有志于多思考自己在课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地理教师们正在积极地通过论文的形式与学者们进行对话。

法杰还邀请了目前在读的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在伦敦一所学校联盟中担任咨询顾问(geography consultant)的学生认为正是来到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不是来向专家寻求答案,而是接触到更多触及本质的问题。这也让他意识到读硕士的本质是开始成为一个能够更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彼此想法的合作者,同时也能够独立做出专业理性的判断。此外,法杰还邀请了自己的两位同事介绍与项目相关的研究,分别是:负责学院教育学研究生证书(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PGCE)教师培

训项目的阿历克斯·斯坦迪什(Alex Standish)博士、参与中学PGCE和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课程导师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博士。他们介绍了各自在做的研究和未来的计划。斯坦迪什是教育学院与地理系之间的联系人,他提出目前教育学院正在积极与地理系合作,运用福赛特奖学金(Fawcett Fellowship)为更多的教师安排一些讲座和工作坊。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让高等教育的课程和学校里的课程之间有一个重新连接。这也是根据他前两年所做的“伦敦地理联盟(The London Geography Alliance)研究项目^[27]”中的成功经验拓展而来。米切尔未来几年将主要负责欧盟委员会资助的地理可行能力项目第三期的研究,他将把社会公正与地理教育结合起来,把教育放在社会的背景下去看。他认为通过地理教育与可行能力的结合,研究者应致力于帮助地理教师更好地把握自己“课程制作人”(curriculum maker),从而让教师能够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地理教育的价值,让学生能够超出自己日常生活的边界,想所未想,在未来的社会中有充分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他们所提到的这些研究与讲座都是未来会与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课程互相补足的内容,能够给予想要更进一步的老师一些可以支撑的脚手架。

三、讨论与思考

2018年底退休的兰伯特教授在这次活动的总结陈词中说到自己认为不能做一个愤世嫉俗的抱怨者,而是要积极尝试谋求改变(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布鲁克斯也强调我们没有任何人是这个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主人,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形成敞亮的理性对话,是为了让地理教育能够继续成为我们的“和平花园”。法杰、斯坦迪什、米切尔这三位目前正守卫着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青年研究者们,在分享中坦陈自己对未来的研究与设想,正体现着他们希望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未来是能够不拘泥于“地理教育”这个小盒子,让学生和自己都能够与更广阔的世界对话。

注:作者所在学院英文名为Institute of Education (IOE)。它自1902年建立至2014年12月并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之前,是属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UoL)的独立学校,曾译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伦敦大学是伦敦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大学联邦。IOE与UCL曾经是平级的,但自2014年12月IOE并入UCL之后,即成为UCL下属的教育学院,改译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因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时期开创发展,本文仍沿用伦

敦大学教育学院这一译本,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 Prof David Lambert [EB/OL]. <https://iris.ucl.ac.uk/iris/browse/profile?upi=DMLAM83>, 上载时间不明, 2018-10-24.

[2] Lambert, D., & Morgan, J. Teaching geography 11-18: A conceptual approach[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Brooks, C. Making the geography curriculum: Reflections on the IGU-CGE London Symposium[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13, 22 (1): 71-88.

[4] Mitchell, D. Geography Curriculum Making in Changing Times [D].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7.

[5][9][10][26] Lambert, D., Solem, M., & Tani, S. Achieving Human Potential Through Geography Education: A Capabilities Approach to Curriculum Making in School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105 (4):723-735.

[6] 缪鑫. 欧盟地理可行能力项目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缪鑫. 2016地理教育国际宪章动向解读——专访IGU-CGE主席Joop van der Schee教授.[J]地理教学, 2016,(9):4-5.

[8] Wadley, D. A. The Garden of Peac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8, 98 (3): 650-685.

[11] Dr Clare Brooks [EB/OL]. <https://iris.ucl.ac.uk/iris/browse/profile?upi=CBROO98>, 上载时间不明, 2018-10-24.

[12] Brooks, C.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 knowledge in the practice of 'expert' geography teachers[D].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7.

[13] Brooks, C. Teacher subject identity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with a professional compass[M]. London: Routledge, 2016.

[14] Firth, R., Brooks, C..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geography education. In Jones, M. and Lambert, D. (Eds.), Debat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 2nd Edition. (pp. 275-286)[C].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5] Brooks, C. Geography teachers' stories of

sustain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16, 25 (2): 97-104.

[16] Brooks, C., Butt, G., & Fargher, M.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C]. Cham: Springer, 2017.

[17] Brooks, C., Gong, Q., & Salinas-Silva, V. What next for Geography Educ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 Commission for Geography Education[J].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idactics in Geography, 2017 (1): 5-15.

[18] Brooks, C. Insights o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education from a review of master's level practitioner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18, 23(1):5-23.

[19] Fargher, M. A Study of the Role of GIS in Constructing Relational Place Knowledge through School Geography Education[D].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3.

[20] Fargher, M.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GI). In Jones, M. and Lambert, D. (Eds.), Debat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 2nd Edition. (pp. 197-210)[C].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1] Fargher, M. Geographic Information (GI) ? How could it be used? In Lambert, D., Jones, M. (Eds.), Debat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 (pp. 206-218)[C].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2] Fargher, M. G. GIS and 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 In Brooks, C., Butt, G., Fargher, M.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 (pp. 151-164)[C]. Cham: Springer, 2017.

[23] Fargher, M. (2018). WebGIS for Geography Education: Towards a GeoCapabilities Approach[J/OL].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18, 7(3), Article 111.

[24] Young, M.. Bringing knowledge back in :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5] Young, M., Lambert, D. , Roberts, C. , & Roberts, M.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School: curriculum and social justice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27] Standish, A., Hawley, D., & Willy, T. The London Geography Alliance: Re-connecting the school subject with the university discipline[J].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2016, 14 (2): 83-103.

(责任编辑: 肖捷)